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党校名师

（第一卷）

刘海藩　朱满良　主编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MING SHI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共中央党校名师

（第一卷）

刘海藩　　朱满良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

《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编委会

主　任　郑必坚

副主任　刘海藩　杨春贵　王伟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伟光　卢先福　朱满良
刘海藩　严书翰　李书磊
李兴山　李忠杰　李援朝
杨春贵　庞元正　郑必坚
贾高建　郭德宏

序　言

郑　必　坚

中共中央党校的历史，如果从1926年我们党中央专门作出《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算起，已经有75年了；如果从我们党于1933年3月在瑞金中央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算起，已经有68年多了；如果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改称中央党校算起，也有66年了。长期以来，中央党校作为党的干部理论教学的最高学府，作为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阐述抓全局问题的重要性时曾经指出，对一个学校来说，选择教员是有关全局的重要环节。党校事业的发展，党校对党的事业的作用的发挥，是同党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的努力分不开的在中央党校的历史发展中，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国际闻名的教员。研究这些名师的业绩，宣扬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治学态度和高尚品格，对于研究中央党校的校史，弘扬中央党校的优良传统作风，启迪教育后人，进一步推进党校事业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决定编纂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名师》。

《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第一卷，编入了已去世的杨献珍、艾思奇、吴亮平、孙定国、郭大力、王学文、黄松龄、范若愚、张如心、李践为、许邦仪、成仿吾、周文、何其芳、何家槐、吕振羽等16位教员（按学科排列）。他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在中央党校工作过、为党校的教学和科研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教员。他们或在教学、或在科研、或在学科专长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但都以其出色

的工作和学术上的成就，堪称一代名师。

他们热爱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为探究党校教学规律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党校作为党的干部学校，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适应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创办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名师，有参与了中央党校创建的，也有建国后调入的；有原来从事理论研究的，而大多数则是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的。但是，他们来到党校后，都把党的干部教育作为神圣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既从事教研，又担负领导工作，在实践中积极摸索干部理论教育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3年，担任马列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即中央党校）副院长的杨献珍，在主持起草的给中央的《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这个“十六字”方针，是党校长期办学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党校干部教育的要求和特点，在经党中央批准后成为中央党校乃至全国党校的教学方针（1956年在文字上修改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其基本精神至今发挥着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以学科划分的教研室的创立，编著了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一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专业教科书。他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的开拓者、奠基人。

他们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我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在他们中，有许多是我国第一批把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过来的大师。郭大力译《资本论》、吴亮平译《反杜林论》、成仿吾译校《共产党宣言》，等等。毛泽东在讲到吴亮平翻译马恩著作的工作时曾评价说：“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他们不仅翻译，而且还用自己通俗化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其中的代表作，这本书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大批青年由读《大众哲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观点，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作出了贡献。例如，王学文在1930年5月发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中科学地论证了旧中国在蒋介石集团上台后的社会性质，指出“中国经济实在处于国内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二重势力压迫下”，“资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之上，并获得政权的只是买办阶级”，被史学界称之为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的”，为党奠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作出了贡献；张如心在1941年2月8日的《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发表于3月20日出版的《共产党人》第16期）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提出这个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最初萌芽性的提法，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的科学说明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艾思奇在思考历史特别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概括出“认识路线”的概念，提出“政治有路线，认识也有路线。一定的认识路线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是联系着的。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政治路线的分歧，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说来，就在于认识路线的不同”；黄松龄在60年代初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共产主义的特性，认为这种特性“从经济方面来说，归结起来基本上是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还提出社会主义也同样会发生经济危机、我们要实行政企分开和利用资本主义管理经济的方法等观点；等等。其他深刻、独到的观点还有许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当然，他们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的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有待实践的检验。但是，正如毛泽东1942年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

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实际作出理论说明，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正是党校名师的风采。

他们能够成为名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严谨治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党性原则。毛泽东曾评价说：“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诚心诚意做学问，严谨治学，可以说是这些名师的共同特点。郭大力从1928年初翻译《资本论》开始，毕生同《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宣传联系在一起。他是在白色恐怖的艰难条件下和王亚南一起完成《资本论》的第一个全译本、独立完成《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是《资本论》第四卷）的。为了准确翻译《资本论》，他翻译、研究了亚当·斯密等的代表作，自学了德文、俄文、日文；为了研究《资本论》，翻译了马恩关于《资本论〉的通信集》；为了完善译本，他两次全面核译、重版，在去世前半身瘫痪的情况下还在按德文新版字斟句酌地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他不仅把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介绍给了我国人民，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权威专家和教员。吕振羽从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开始，坚持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专著17部，著述达600万字。他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国历史，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个提出了殷代已进入奴隶社会、西周开始为封建社会等观点。1963年1月，他蒙不白之冤身系囹圄，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甚至连稿纸都没有的情况下，利用仅有的两份报纸在废报上写下了20多万字的《读报随笔》，成为后来出版的他的《史学评论》一书。他深入治学和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代宗师，成为中央党校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员之一。杨献珍在1936年被捕入狱后，在狱中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经典著作，研究和组织难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薄一波所说的那样“杨献珍办党校应当说是从草岚子监狱开

始的”。50年代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仍然承担教学任务，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在课堂上针砭时弊，分析批判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50年代末，他讲了《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等专题课，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五风”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他曾因此以及其他理论观点，遭到康生的迫害，先是降职、后又坐牢和流放，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观点。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名师》，既是对他们的纪念，更是对后人的鞭策。今天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同志尤其是青年教员，都应当永远怀念并认真学习老一辈名师的精神、学风和风范。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面对国际国内发生的大转折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我们深感历史将中央党校推向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于2000年作出了《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提出了党校工作面向21世纪继续发展的大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素质，大力推进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党校改革和发展，把党校事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办好党校，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与中央党校的地位和所承担的任务相适应的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伟大的变革时代应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们中央党校的教员，一定能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党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必将继往开来，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名师！

二〇〇一年六月於北京

目　　录

序　言 —— 郑必坚（ 1）

革命家·教育家·哲学家
——记杨献珍 —— （1）
一代名师
——记艾思奇 —— （72）
“ 功盖群儒 ”
——记吴亮平 —— （117）
党理论宣传战线上勇于斗争的战士
——记孙定国 —— （145）
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一生
——记郭大力 —— （172）
追求真理的学者，诲人不倦的师长
——记王学文 —— （208）
求真务实的革命家、教育家、学者
——记黄松龄 —— （233）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记范若愚 —— （258）
理论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记张如心 —— （289）

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
——记李践为 （323）
理论联系实际的党建理论耕耘者
——记许邦仪 （354）
革命家·教育家·社会科学家
——记成仿吾 （363）
党校语文教学的开拓者
——记周文 （395）
诗人·学者·教员
——记何其芳 （423）
作家·文学评论家
——记何家槐 （452）
一代史学大师
——记吕振羽 （478）

后　记 （510）

革命家·教育家·哲学家

——记 杨 献 珍



图 1—1杨献珍同志

杨献珍（1896—1992）湖北郧县人。1920年毕业于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曾两次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1936年9月出狱后，到山西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武装斗争以及党务工作。1940年后，历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1948年夏以后，历任马列学院教育长、副院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作出版有《杨献珍文集》（3卷集）及《我的哲学"罪案"》等。

红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以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逐渐成熟

杨献珍于1916至1920年在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杨献珍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利用学校的条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英文，还由于受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毕业时放弃了银行以优厚待遇的聘请而留校当了助教。在此期间，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取得了一条重要的学习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认真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1926年10月，杨献珍目睹了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战斗，钦佩首先攻入武昌的叶挺率领的“铁军”独立团，立即参加了宣传北伐的活动，动员群众支持国民革命军把北伐进行到底。武汉区委看到杨献珍有渴望入党的要求，指派两位党员和杨献珍谈话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武汉市委指示他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1月杨献珍任武汉第二中学训育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率领二中部分师生参加武汉群众收复英租界的斗争，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同年5月，任武汉市第三区区委委员，参与区委的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1927年8月他被捕，按“共产嫌疑犯”判12年有期徒刑，经社会各界营救，于1929年7月无罪释放。后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春，杨献珍和陈赓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和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7月到北平，在与党的关系人接头时被逮捕。面对刑讯，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任中共狱中支部干事（支委）时，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等经典著作，组织难友学习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把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薄一波说：“杨献珍办党校

应当说是从草岚子监狱开始的”。抗日形势的发展，急需大批党员干部领导斗争。经北方局建议、党中央批准，杨献珍在1936年9月和薄一波、殷鉴等履行了出狱手续，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杨献珍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室秘书、军政训练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阎锡山请薄一波接办牺盟会，委托杨献珍重新起草牺盟会纲领。杨献珍从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入手，用山西语言表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理论，以守土抗战为目的，写成的《牺盟会纲领》，既贯彻了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又使阎锡山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牺盟会的存在，给救亡人士开展活动提供了阵地。

1936年冬，日军侵入察北绥东威胁平津，阎锡山向抗日方面倾斜，提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的口号和训练2万连排级干部、30万国民兵的计划。杨献珍任军政训练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和宣传总干事。山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进步青年和东南亚华侨。当时开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吸收这些青年和华侨进行培训。杨献珍兼任军政训练班第6连指导员和民训教练团第6队指导员，负责教学、训练和生活管理工作，并且讲授政治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牺盟会负责，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杨献珍任第2战区随营学校教务主任，为决死队培养军政干部。

1937年11月，日军分两路逼进太原。阎锡山率后方机关撤到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以及牺盟会总部等，也相继撤到临汾，太原失守。杨献珍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军政委员会委员、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校长。日寇攻占临汾，杨献珍率领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学员转移到敌后山区，组成游击第1和第2支队，在校时学习，打仗时参战，战役结束回校休整总结、学习，新的战役开

始，再出去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晋南10余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汉奸。经决死三纵队批准，将两支部队合并为正规部队游击十团，成为三纵队主力，战功累累，解放战争时期荣获“临汾旅”称号。

193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日军主要力量转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磨擦事件。阎锡山密切配合，取消了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将新军统一于旧军，取消牺盟会，撤消抗日县长，取消抗日以来的一切进步法令。面对这种险峻的局势，山西省委和牺盟会、山西新军领导决定：不怕翻脸，不怕破裂，准备应付突然事变。1939年七八月，日寇打通了白晋路，五专署被分成路东、路西两大片。当时任山西第五专署党团成员、秘书主任的杨献珍，率部分专署工作人员、政训队和保安第9、10团，成立了五专署路东办事处。一方面，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创办《黄河日报》路东版；另一方面，清理整顿保安团和各县大队以及公安局，使武装力量和政权确实掌握在党的手里。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使抗日力量遭到惨重损失。杨献珍领导的路东地区由于有了充分准备，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1940年1月杨献珍在《新华日报》发表《论十二月政变》，指出“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统一战线中的统一与斗争的关系缺乏辩证的了解。只讲统一，忽视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本来就是矛盾的统一，不认识矛盾统规律，以至在紧急关头遭到失败。”他又在给薄一波的电报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所得的经验教训在总的方面说，我们在抗战中只把握了统一战线的一面，而忽视了阶级斗争的一面。统一战线本来是矛盾的统一，但我们忘记了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规律，政治上麻痹，即由此产生的。”

1940年1月，杨献珍被调到北方局任秘书长。在北方局工作的两年中，他把政权问题理论与“十二月政变”经验教训结合起

来，对抗日根据地的性质和政权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介绍晋察冀边区改造政权的经验》、《论抗战教育的价值与训政制度的价值》、《政权怎样推进民主，人民怎样运用民主》、《华北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略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以及《论新民主主义司法建设的方向》等文章，论述了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问题。同时，还在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布）党史》。

杨献珍这一段工作，表明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成熟。

二、党校教学经验的概括，“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方针的提出

1942年2月，杨献珍被调到北方局党校任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从此终生专门从事党校工作。

北方局党校的学员有部分地委级干部，大多数是县团级干部。这样的对象，要求教学人员不仅要有系统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且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说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政策；并且把理论、路线、政策和学员的工作、思想、作风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胜任教学。为此，杨献珍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原著，还经常到北方局去听区党委的汇报，仔细了解学员的情况。他说：“这些汇报的内容丰富生动，给我提供了联系实际的很多材料。”“有关学员的材料，如档案材料等，都仔细翻阅，老实说，我对学员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讲课不仅阐明原理深刻、精辟，而且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学员的工作思想和作风实际，使学员深刻理解理论的精神实质，并能把党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思想作风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

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党校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当转移到十字岭时，敌军包围上

来。左权指挥警卫部队掩护彭德怀等先冲出重围，再冒着炮火指挥机关人员转移，不幸壮烈牺牲。杨献珍目睹了这悲壮场面，强忍悲痛，由两个部队来的学员带他撤到一个山头，又带他从山坡上滚下山来，这才脱险。一位学员看见杨献珍紧紧抱着一个包裹，诧异地问道：“这样危险的时候，还带行李干吗？赶紧丢了吧！”杨献珍说：“这里是几本《列宁选集》，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的，今后讲课还用得着哩！”反“扫荡”结束，在返回党校驻地的路上遇到彭德怀，彭总说：“我发电报，查问你的下落，回电都说没有见到，我还以为你牺牲了呢。”又说：“敌人扫荡如此频繁，党校跟着总部行动，学员不能安定地进行学习。我给你们找个较偏僻的敌人不容易进入的地方，你们住在那里，也免得经常行军转移耽误学习。”杨献珍十分赞成。于是，党校移到与河南临界的熟峪。

1942年7月，中央发表了毛泽东整风报告等整风文件，全党开展整风。配合整风学习，杨献珍发表了《论箭》、《何谓党性》、《关于党性问题答问》、《关于党性认识问题》等文章。

1943年初，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区党委一级的干部来党校学习。主要是以整风精神学习哲学理论和讨论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彭德怀亲自领导。杨献珍讲哲学课，参加整风工作。学习结束时，杨献珍写了《介绍北方局地委会议整风学习的经验》，发表在《党的生活》。1943年10月，学习结束转入审干阶段，建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由于贯彻中央（延安）“左”的指导思想，工作发生严重偏差，一批共产党员干部遭到严重伤害。杨献珍作为党校的主要负责人、审干委员会成员，对这次审干的错误负有责任。党中央发现“左”的错误，做出甄别平反的决定。1944年夏，北方局党校为这些无辜受害的同志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做出正确结论。杨献珍对这些受伤害同志的歉疚长期耿耿于怀。他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8期整风审干的经过及点滴经验的总结》。这个总结，毛泽东看过说：“很好”。

1945年1月，杨献珍由晋冀鲁豫根据地到延安，被任命为中

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

1945年4月，杨献珍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认真记录了中央负责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特别是记录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和会后的几次讲话，印发给各地参加会议的负责同志，供他们学习与回去传达之用。全国解放后，杨献珍把他整理的记录稿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其中的《愚公移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中央决定由中央党校抽调数百名干部由黄火青和杨献珍带队，奔赴东北，开辟工作。12月中旬，行至张家口，因战事滞留待命。晋察冀中央局请求中央党校干部队协助他们办党校。杨献珍留下来帮助创办党校。

1946年1月，杨献珍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在教学过程中，有一次他问学员：“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学员答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进一步问：“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员没有答上来，引起杨献珍的高度重视。他想，党校要帮助学员解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从这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杨献珍在党校教育中经常注意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

杨献珍认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要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实际，而且还要结合每个人的工作思想作风实际，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其中的经验主义，改造学员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从而提高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和领导能力。为此，要求用整风方法进行教学。要求学员把所学的理论结合自己工作思想作风实际，进行对照分析，了解哪些工作做对了，为什么是对的；哪些工作是做错了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写出思想总结拿到小组会上，让大家评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红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